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呼伦贝尔联合考古队
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

关键词：内蒙古 陈巴尔虎旗 岗嘎墓地 独木棺 蒙古族源

KEYWORDS: Inner Mongolia Chen Barag Banner Gangga Cemetery Log Coffins
Origin of Mongol Ethnic Group

ABSTRACT: In July through October 2014, the joint Hulun Buir Archaeological Team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onducted excavation to the Gangga Cemetery in Chen Barag Banner. This cemetery covering an area of about 2 ha was located on the riverbank terrace about 6 km to the east of Hoh Nor Town and about 600 m to the south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Hailar River. The excavated area is 680 sq m, from which 16 burials were recovered. All of the burials had wooden burial receptacles, most of which were log coffins, and some of them were furnished with wooden board coffins. The grave goods unearthed from these burials included potteries, wooden saddles, birch bark quivers, iron arrowheads, bronze belt ornaments, agate beads, etc. The date of Gangga Cemetery was around the 8th to 10th centuries AD, which is significantly valuabl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ation of the Mongol ethnic group.

岗嘎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镇（原名完工镇）东约6公里的一个傍河台地上，北距海拉尔河干流约600米，南约1公里为滨（哈尔滨）洲（满洲里）铁路，东距呼伦贝尔市区约55公里，东北距陈巴尔虎旗政府所在地巴彦库仁镇约36公里，西北与东乌珠尔苏木隔河相距约7公里（图一）。墓地所处范围为缓坡沙丘，地表植被稀疏，南侧沙地与草原的分界线尤为明显，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

一、项目缘起与发现经过

关于蒙古族的起源有不同的传说和多



图一 墓地位置示意图

种学说，至今尚无定论。开展蒙古族寻根探源研究，同时在其发祥地域开展元朝帝陵的探寻调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2012年8月，“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被正式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批准号为12@ZH014）。本项目将以科学构建蒙古史前史为主要学术目标，系统阐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的蒙古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早期历史，揭示森林、草原民族崛起的原因、机制、特点及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采取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方式予以推进。通过在呼伦贝尔地区系统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为蒙古族源研究提供系列考古实证资料，同时开展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推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蒙古族源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确立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作为蒙古族发祥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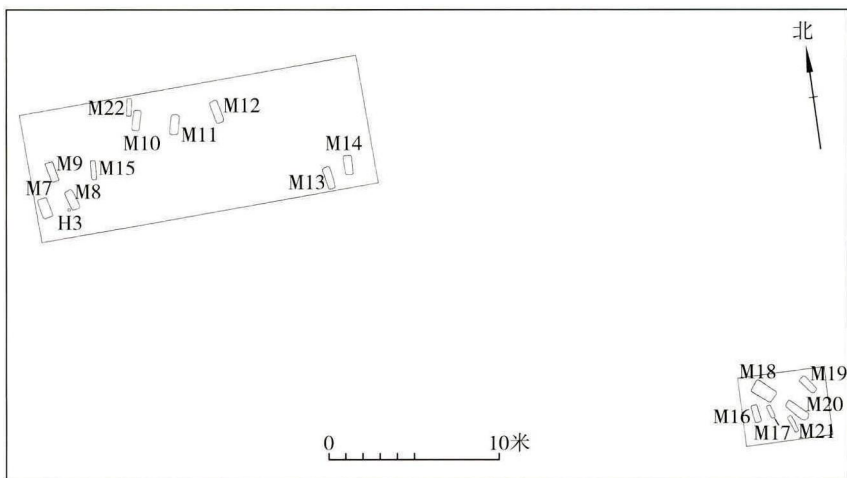
2013年8月，根据陈巴尔虎旗民族博物馆专业人员提供的线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组成的呼伦贝尔联合考古队，对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调查，在地表采集到陶器碎片、铁镞等遗物及人骨。从采集陶片的特征看，分为泥质灰陶与夹砂灰褐陶两大类，轮制陶与手制陶共存，可辨认出罐、壶两种器形，据此初步判断岗嘎墓地应该是一处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遗存。为了搞清楚该墓地的

文化性质与年代，了解墓葬的埋藏和保存状况，寻找与蒙古族源相关的重要考古遗存，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批准，对墓口暴露出地表的6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从清理情况看，岗嘎墓地的墓葬以独木棺为主要葬具，随葬品丰富，主要有装饰品、生活用具、骑射用具等，属典型的游牧民族文化遗存。棺木样品经碳十四测年，其年代为公元8~10世纪。2014年7~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呼伦贝尔联合考古队对岗嘎墓地进行了系统钻探和正式的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这是呼伦贝尔地区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为探寻蒙古族源提供了最新的考古实证资料。

二、主要考古收获

2014年的发掘区位于岗嘎墓地东侧，发掘面积为68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16座（图二；图三）。墓葬均叠压在黄色沙土层下，打破黑色沙土层。从墓坑的形制看，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底部平整。

共有15座墓葬发现了木质葬具，其中9座墓葬（M7、M9、M11、M13~15、M18、M20、M22）的葬具为独木棺。独木棺多是根据人的身形大小选择一段松木，将中部凿空制作而成，保留树干的两端成为实心的棺



图二 2014年发掘区墓葬分布图



图三 2014年发掘区局部（航拍，上为东）

头；埋葬时将死者和随葬品放置其内，用树皮或兽皮包裹。每座独木棺大小不一，棺木粗细也不尽相同。其中，M7的独木棺长1.73、宽0.37~0.45米（图四）；M11的独木棺长1.73、宽0.47~0.55米（图五）；M13的独木棺长1.72、宽0.42米（图六）；M15的独木棺长2.1、宽0.4米；M18内西南侧的独木棺长1.93~2、宽0.49~0.5米，东北侧的独木棺长1.8~1.84、宽0.4~0.47米（图七）。



图四 M7（东北→西南）

M20发现的独木棺长2.23、宽0.45~0.56米，是本此发掘所见最大且保存状况最好的一例，为了解该墓地独木棺的形制结构和使用方式提供了珍贵资料（图八；图九；图一〇）。

以木板棺作为葬具的墓葬有6座（M8、M12、M16、M17、M19、M21）。岗嘎墓地发现的木板棺均呈长方形，残朽严重，只保留有棺木腐烂痕迹。木板棺的两侧棺壁较长，两端棺板较窄，略超出两侧棺壁。其中M8、M17的葬具较为特殊，M8在木板棺

内底部铺垫一层桦树皮（图一一）。M17的墓主人是一位儿童，其棺盖之上覆盖一层桦树皮，棺壁板痕迹清晰，东北侧和西南侧棺壁均长1.28、棺壁内侧宽0.21~0.27米；东南端棺板长0.4、厚0.02~0.03米；西北端棺板长0.42、厚0.04~0.05米。

由于风蚀破坏，M10仅存墓坑底部，未见棺木残留痕迹，已无法准确判断葬具的形制。

墓主人葬式多为仰身或侧身屈肢葬，少数为仰身直肢葬。头向朝北、西北或东北，以单人葬为主。M18是已发掘墓葬中唯一的一座双人合葬墓，死者为成年女性和未成年男性，这是在呼伦贝尔草原首次发现的以独木棺作为葬具的男女合葬墓（见图七）。

在这批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十分丰



图五 M11 (东南→西北)



图六 M13 (西南→东北)



图七 M18 (东北→西南)

富, 依其功能可分为生活用具、装饰品、骑射用具等。生活用具主要有陶罐、陶壶、桦树皮罐等。在此次发掘的16座墓葬中, 有11座随葬陶器, 共有15件, 其中有4座墓葬各出土2件, 其余墓葬皆出土1件。陶器多出土于墓主人头部、足部或两腿之间。例如, M8随葬1件陶罐, 放置在墓主人两腿之间(图一二)。M10随葬1件陶壶, 出土于墓主人足部(图一三)。M18内随葬2件陶罐, 分别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和足部(见图七)。M11内随葬陶罐和陶壶各1件, 出土于墓主人足部西侧(见图五)。陶器制法可分两类, 一类为轮制, 另一类为手制。质地为夹砂陶或泥质陶, 多饰以篦点纹和附加堆纹。器形有罐和壶两种, 罐又分为鼓腹罐和筒形罐两类(图一四; 图一五; 图一六; 图一七)。

装饰品包括有



图八 M20（西南→东北）



图九 M20独木棺头端（东北→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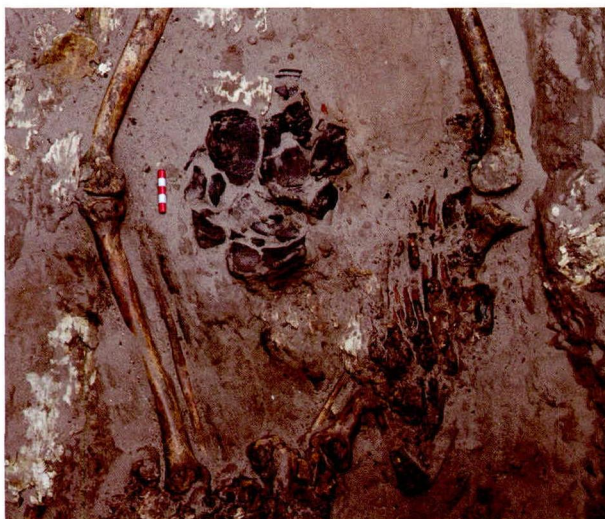


图一〇 M20独木棺脚端（东北→西南）

棒形玉饰、红色玛瑙珠饰、玻璃珠饰、铜带饰、铜或银质耳饰等。玉器仅有1件棒形饰，出自M11墓主人左侧肩胛骨之上，青白色，初步判断应为和田玉。棒形饰两端稍粗，中间微细，器身共有八棱八面；一端有钻孔，近钻孔的端面圆润，另一端呈斜面状；长9.5厘米（图一八）。随葬珠饰的墓葬有3座。M11出土玻璃珠2枚、玛瑙珠1枚。其中2枚玻璃珠分别出自墓主人头顶正中和头骨左侧，呈椭圆形，白色透明状，中间有钻孔；1枚玛瑙珠出自墓主人颈部右侧，酱红色，器身有七棱七面，纵截面呈枣核形，中间有钻孔（图一九）。M15共出土了5枚珠饰，集中发现于墓主人的颈部右侧。其中有3枚玛瑙珠，1枚呈紫红色，另1枚呈白色，均为圆球状，表面有光泽（图二〇）；还



图一— M8 (西→东)



图一二 M8出土陶器及木杆铁箭镞(南→北)



图一三 M10出土陶壶(西南→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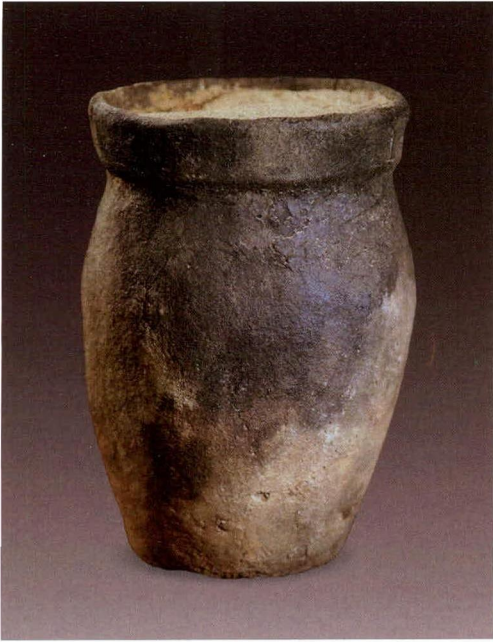
有1枚呈灰色，略残，柱状体，中部略粗，两端稍细，表面光滑。M18出土了2枚玛瑙

珠，1枚出自墓主人下颌骨右侧，另1枚出自墓主人盆骨右侧，均为酱红色，圆形，中间有钻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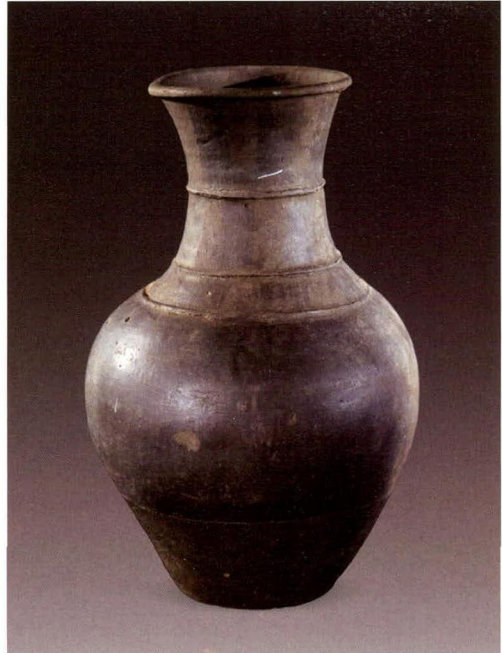
出土铜带饰的墓葬有5座，通常每墓为1~8件。M22出土的数量最多，共有36件，应为一条完整的铜带饰，

环绕分布于墓主人的腰际(图二一)。带饰出土时有单件放置也有组合分布，形状有方形、环形、半圆形、心形、长条联弧形等等，多镂空并有繁缛而规整的缠枝纹；铜带饰的背面多有皮质物附着，工艺精湛(图二二；图二三)。铜耳环共有2件，出自两座墓葬内，其中1件发现于墓主人的右耳部。

骑射用具主要有桦树皮箭囊、箭、木弓、木马鞍、铁马镫、铁马衔等。桦树皮箭囊共出有3件，其中M7出土的1件顺置于墓主人上身右侧，紧贴西南侧棺壁，底面略呈椭圆形，长约84厘米，是岗嘎墓地已发现最长的桦树皮箭囊(见图四)。M9的1件为长条筒状，出土时没有发现箭杆或镞，囊体被压扁，开裂严重。M20出土了桦树皮箭囊和铁箭镞1套、弓1把、马鞍1付。桦树皮箭囊顺置于墓主人上身左侧，保存较好；铁镞露出箭囊，靠近墓主人头部左侧，锈蚀严重；木弓置于墓主人右肱骨右侧，紧贴西南棺壁，保存较好，其上缠绕有桦树皮；木马鞍置于独木棺内东南端，被挤压变形(见图九、图一〇)。M22出土铁镞14枚，集中放置在墓主人左股骨上端，可分铲形、窄方形、柳叶形三种形状，皆锈蚀严重(图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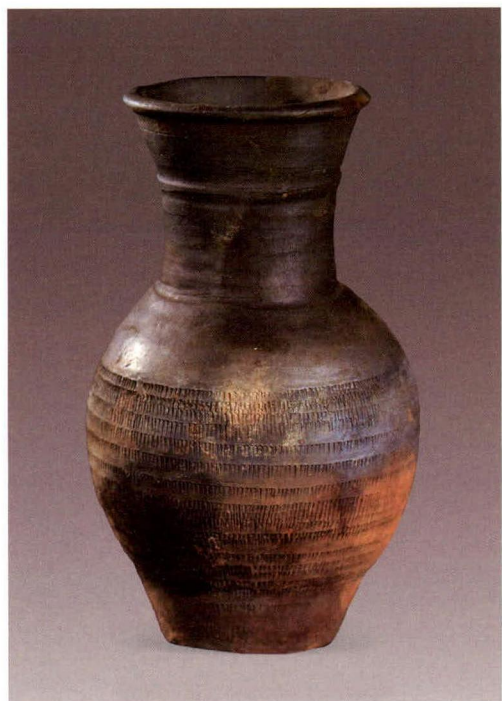
图一四 陶罐 (M9:1)



图一六 陶壶 (M10:2)



图一五 陶罐 (M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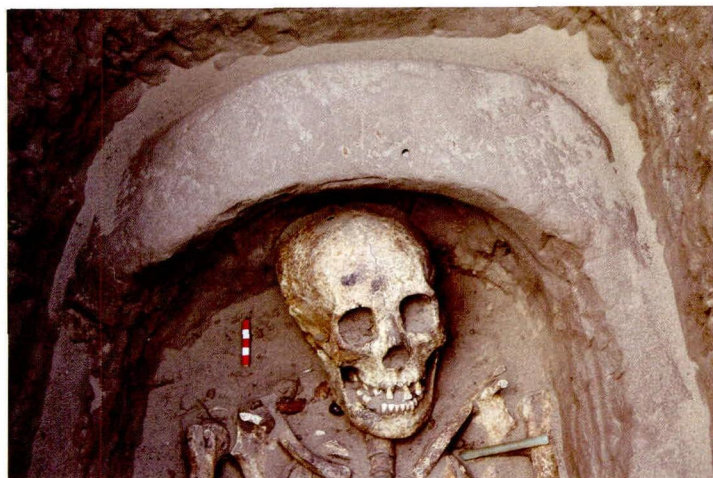
图一七 陶壶 (M18:2)

三、学术价值及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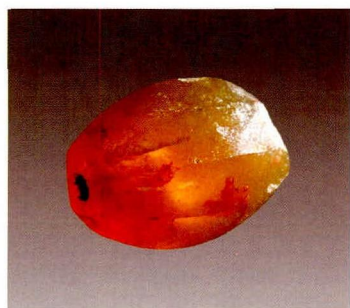
岗嘎墓地的发掘，有助于构建呼伦贝尔草原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序列，通过与本地区相关考古材料的比较分析，能够初步推断岗嘎墓地的文化性质与年代。所取得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对于探寻蒙古族源具有十分重要的

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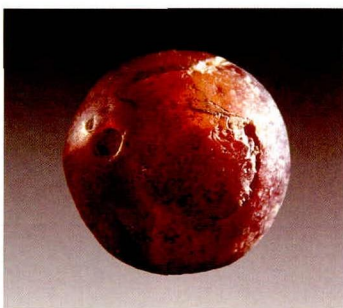
第一，岗嘎墓地现已探明分布有墓葬86座，是呼伦贝尔草原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古墓群，经过考古发掘的墓葬已有22座。墓葬



图一八 M11墓主人头部随葬品分布情况(西南→东北)



图一九 玛瑙珠(M11:4)



图二〇 玛瑙珠(M15:2)

分布密集,排列有序,独木棺为主要葬具,木板棺数量偏少,随葬品丰富,具有典型游牧民族文化的特征。墓地的年代大致为公元8~10世纪。岗嘎墓地的发掘,是进入21世

纪以来呼伦贝尔草原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元史·祭祀志》记载蒙古皇族用独木棺作为葬具,“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1]。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曾记述:“元朝棺裹,用椴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2]。岗嘎墓地发现的独木棺的形制,为后世蒙古皇族使用独木棺作为葬具找到了重要源头。

第二,从葬具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特征等方面看,岗嘎墓群与呼伦贝尔草原已知的扎赉诺尔^[3]及拉布达林^[4]等鲜卑墓葬遗存、以巴彦库仁^[5]为代表的典型辽代墓葬遗存均明显不同,而与西乌珠尔^[6]、谢尔塔拉^[7]墓葬遗存有一定共性。

西乌珠尔墓地位于陈巴尔虎旗政府所在地巴彦库仁镇西北约80公里的沙丘台地上,



图二一 M22出土铜带饰(西南→东北)

南距海拉尔河约0.5公里,1986年和1995年经过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了6座墓葬。发现的葬具形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独木棺,有3座墓;第二类为木板棺,有2座墓;第三类为桦树皮葬具,仅见1座墓。1986年清理的3座墓葬均以独木棺作为葬具,是将圆木截出所需长度,顶部修整出平面,中部挖出长方形凹槽,将死者和随葬品放入凹槽内。86M2、



图二二 铜带饰 (M22 : 29)



图二三 铜带饰 (M22 : 25)



图二四 铁镞 (M22 : 40-1 ~ 7)

盖板的东南部铺盖有桦树皮，保存完整；M7棺盖板上整体铺一层桦树皮，中部有一纵列较整齐的小圆孔，证明其东北、西南两侧的桦树皮原是缝合在一起的。谢尔塔拉墓地没有发现独木棺，这一点与岗嘎墓地明显不同。但是，

86M3的独木棺保存完整，前者长1.9、宽0.5~0.55米，后者长2.14、宽0.72米。岗嘎墓地与西乌珠尔墓地所发现的独木棺形制相仿，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共性，而岗嘎墓地现已发现的独木棺的数量和所占比例明显多于西乌珠尔墓地。西乌珠尔墓地所发现的2座木板棺，棺体近似长方形，头端略宽，尾端稍窄；四角各立一根方形木柱，其上凿出长方形卯孔，棺壁板两端各有凸出的榫头插入卯孔内。95M2的木板棺保存完整，无盖无底，与岗嘎墓地所发现的木板棺形制不同。

岗嘎墓地所发现的木板棺均有盖无底，个别墓葬棺底或棺盖板上铺桦树皮的习俗与谢尔塔拉墓地的葬俗比较接近。

谢尔塔拉墓地位于海拉尔区谢尔塔拉镇东约5公里的台地上，南距海拉尔河2公里，1997、1998年共发掘了10座墓葬。从保存较好的8座墓葬的葬具情况看，除M6为一棺一椁外，其余7座墓葬内均为单棺。木板棺的形制分为有盖有底、有盖无底、无盖无底三类，其中有盖无底的木棺占绝大多数，共有6座；有盖有底和无盖无底的木棺各有1座。在棺盖板上铺盖桦树皮的共有3座墓，其中M1棺盖板的西北端残存有桦树皮；M10棺

西乌珠尔墓地所发现的6座墓葬均为仰身屈肢单人葬，头向朝北或西北，随葬品放置在墓主人头部、足部、双腿之间或身体一侧。例如，86M2墓主人身体右侧放置1件桦树皮木弓，左肱骨上压放了1件木马鞍。95M2墓主人头部左上端和足部左下端分别放置1件陶罐和1件陶壶；墓主人身体右侧顺置1件桦树皮箭囊，内装12枚箭，均为木杆铁镞；箭囊之上压放1件皮革缝制的弓囊，内装1件木弓；墓主人腰部放置有木马鞍，双股骨间发现有铁马镫。

谢尔塔拉墓地以单人葬为主，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仅有1座。葬式以侧身屈肢葬为主，俯身屈肢葬仅有一例，墓主人头向均朝东南。随葬品集中发现于木棺内，从出土位置看可以分为四种情况。（1）直接压放或扣置于墓主人身上，如M6墓主人身上压放大木弓和木柄铁矛各1件，M10墓主人的头部扣

置1件木盘。(2)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周围或身体一侧,如M8墓主人头部东北侧放置陶罐、陶壶各1件,M9墓主人头部两侧分别放置陶罐和桦树皮罐各1件,M4和M6内的桦树皮箭囊均顺置于墓主人背部一侧。(3)枕放在墓主人头骨下方,如M6墓主人头下枕放1件木材和桦树皮制作的马鞍。(4)佩戴在墓主人耳部、颈部及手、足腕部,如M1墓主人耳部佩戴1件金耳坠,颈部佩戴10枚玻璃珠组成的串饰,左手腕部佩戴1件银镯;M10墓主人左、右耳部各佩戴1件鍍金银耳坠,颈部佩戴96枚玻璃珠组成的串饰。

墓主人多为屈肢葬是上述三处墓地的共同特点。从随葬品的功能和特征看,陶器是主要的生活用具,以罐、壶为主要组合。装饰品中各类珠饰和耳环流行。骑射用具的种类和数量丰富,弓、箭、箭囊多成组出现,马鞍、马镫、马衔等十分常见。这些共性足以印证西乌珠尔、谢尔塔拉和岗嘎三处墓地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谢尔塔拉墓地的两座女性墓中均出土有玻璃珠串缀成的项饰,岗嘎墓地的三座女性墓中在墓主人的颈部均出有红色玛瑙珠等饰品,这与古代文献中记载室韦人“俗爱赤珠,为妇人饰,穿挂于颈,以多为贵,女不得此,乃至不嫁”^[8]以及“富人以五色杂珠垂领”^[9]相印证。成组的弓、箭、箭囊、马具等骑射用具的发现,与古代文献中记载室韦人“用角弓,其箭尤长”^[10]以及“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11]相符合。

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表明,从头骨形态特征和颅面特征综合来看,谢尔塔拉墓地出土人骨具有蒙古人种的一般特征,如卵圆形颅,眉弓、眉间突度不发达,面部扁平,鼻根凹陷浅,鼻骨突度弱等。特别是普遍的颅型特点,如短阔颅型、颅较低、垂直颅面指数大及额坡度较倾斜等,显示谢尔塔拉人群更接近蒙古人种北亚类型^[12]。在以往的研究中,将西乌珠尔和谢尔塔拉墓葬为代表的遗

存命名为“谢尔塔拉文化”^[13],代表了公元7~10世纪活动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室韦人的遗存。岗嘎墓地的新发现,极大丰富了对于谢尔塔拉文化内涵的认识,为研究室韦人的历史以及探索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科学的考古实证材料。

第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人类学实验室对采集自岗嘎墓地的18例人骨标本进行了形态学鉴定和人类学观测。在性别与年龄鉴定过程中,根据标本的具体保存情况及部位,对骨骼的各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共鉴定出男性11例、女性4例,疑似男性、女性各1例,无法判断性别者1例。标本中可判定年龄范围者17例,根据阶段性年龄分布情况可知,该墓地古代居民死亡年龄主要在青年(15~23岁)、壮年(24~35岁)、中年(36~55岁)三个阶段,尤以壮年为多。

根据相对完整的颅骨样本进行观测,在颅型特征方面,岗嘎墓地出土的人骨并不存在明显的两性差异。颅指数以圆颅型(指数范围80~84.9)为主,另有两例男性个体为较圆的中颅型(指数范围75~79.9),一例疑似顶骨人为变形的个体为特圆颅型(指数范围85~89.9)。颅长高指数以低颅型(指数低于69.9)为主,另有两例男性个体为正颅型(指数范围70~74.9)。颅宽高指数均表现为阔颅型(指数低于91.9)。鼻颧角多数较大。这些测量结果与历史上发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鲜卑等游牧民族的颅面特征颇为相似,均属于低而阔的颅型与圆颅型相结合,且面部形态颇为扁平,又与现代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面特征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中央亚细亚类型主要分布在现今的蒙古国以及我国的内蒙古地区,在广义的地理单元上属于蒙古高原地区,是当今蒙古族的主体人种类型,颅型以短颅、阔颅和偏低的正颅型为主要特征,面部高、宽而且极为扁平。岗嘎墓地的相关发现与研究,为确立呼伦贝尔草原作为蒙古族起源地



图二五 发掘现场墓葬套箱整取

第五，以岗嘎墓地考古发掘所获材料为基础，将深入推进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力争取得具有创新性的蒙古族源研究成果，科学地构建蒙古史前史的框架。推进蒙古族源的深入研究，科学阐释在中华民族相互融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中，蒙古民族所发挥的十分重要的

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第四，岗嘎墓地的考古发掘引入实验室考古的理念，在田野发掘现场将所有墓葬套箱整取（图二五），运回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开展实验室考古清理，做好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采用多种方法采集和记录信息，包括摄像、红外照相、三维扫描等。实验室考古之程序，不只是对遗迹和遗物进行室内发掘清理，同时还需要即时对发掘对象进行科学检测分析，如土壤成分、结构、温度、含水率、酸碱度等，以及各类遗物本体的材质、破损状态、性质、成分、温度、湿度和硬度等。由于许多质地脆弱的遗物被发掘出土后，需要使用加固和封护材料进行预保护处理，因此要在遗物出土后及时采集原始样品，以备检测之用。另外，还要对发掘对象的保存状态实施及时监测，包括环境变化、遗物本体劣化状态及趋势等。因此，准确把握埋藏遗物出土的环境条件，模拟与其比较接近或相似的环境状态，是保证出土遗物能够长久保存的重要环节。通过开展实验室考古，对岗嘎墓地出土的独木棺、木板棺实施科学保护，开创了呼伦贝尔草原实验室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

的作用。同时对蒙古民族所创造出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将极大丰富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客观揭示蒙古民族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贡献。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ZH014）的阶段性学术成果。

执笔者 刘国祥 白劲松 陈永志
李存信 沈睿文

注 释

- [1] 《元史·祭祀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
- [2]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
- [3] a.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第9期。
b.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12期。
c.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
d.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4] a.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年第10期。
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 [5]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辽代墓葬清理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 [6] a.白劲松:《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2期。
b.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古墓葬调查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2期。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海拉尔区文物管理所:《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 [8] 《魏书·室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 [9] 《新唐书·室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 [10] 同[8]。
- [11] 《旧唐书·室韦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 [12] 张君:《谢尔塔拉墓地的人骨初析》,见《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 [13] 刘国祥、白劲松:《论谢尔塔拉文化及相关问题》,见《海拉尔谢尔塔拉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 杨 晖)

○信息与交流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简介

《一个考古学文化交汇区的发现：凉山考古四十年》由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联合编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共734页，约118万字，文后附有彩色图版16页。定价368元。

这是一本结合资料集、志书、研究著作于一体的考古学专著，总结了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主体的地区1974~2013年40年间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成果。全书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时期考古、西南夷时期考

古、两汉时期考古、蜀汉两晋时期考古、唐宋时期考古六个部分对凉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系统介绍和研究，并提出了凉山考古学文化圈和东亚大陆“X”形文化传播带的新概念，书中还包括了与凉山地区有关的专题考古、民族学田野调查和科技考古等内容。本书对于全面了解凉山地区考古工作的基本概况具有重要价值，可供从事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文 耀)